



柳鸣九
巴黎对话录



巴黎对话录

柳 鸣 九

湖南人民出版社

巴黎对话录

柳鸣九

责任编辑：管筱明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6,000 印张：7.375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10109·1570 定价：0.77元



在阿兰·罗伯—葛利叶的办公室



在加斯卡尔夫妇的寓所



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工作室



在洛布莱斯的寓所

前 言

根据中法双方关于学者互访的协议，我于一九八一年十月至一九八二年一月，在法国进行了三个多月的学术考察。同时进行考察的，有《世界文学》编辑部的金志平同志。

在考察中，我们会见了一些法国文化界人士，我与他们进行了学术性的谈话。这就是这本小书的来由。

我是一个“土人”，虽然学了外文，算是搞外国文学的，但既没有长期在国外“深造”和工作的资历，也很少有在国内的“外事工作经验”，逢上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是年趋半百的“中年人”了。就我的上述情况来看，我并不认为自己很有资格来写一本访问外国作家学者的书，不过，我想，既然作了一次考察，就应该向

国人交一份报告，既然与法兰西文化生活中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见过面、谈过一些问题，也值得留下几幅掠影，而且，既然有长期对外文化交流经验的权威、学者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还没有做这一工作，我也就不妨先“抛砖引玉”了。

我们在巴黎考察期间，喜逢沈志明与金德全两位同志，他们都在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已在巴黎多时，对那里的情况非常熟悉，堪称“老巴黎”，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了多方面的协助，特此志谢。

最后，作一点说明：本书的目次以会见的先后次序排列，而会见的先后次序，并不是出于任何主次轻重的考虑，只是根据我们当时时间上的方便和法方的工作条件而定的。这些会见绝大部分都是法国外交部文化技术司接待办公室安排的，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当·马第维先生对中国学者热情友好的态度至今使人难忘。

柳鸣九

于一九八二年盛夏

目 录

前 言.....	1
“于格洛采地”上的“加尔文” ——访阿兰·罗伯-葛利叶.....	1
我们不能忘记的这位老朋友 ——访皮埃尔·加斯卡尔.....	23
与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 在一起的时候.....	36
“作家之友” ——访克洛德·迦里玛.....	53
掌握着龚古尔学院标准的人 ——访艾玛吕埃勒·洛布莱斯.....	63
我所见到的“不朽者” ——访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80
现代派文学的“工匠” ——访米歇尔·布托.....	95
访雅克·塞巴谢教授.....	124

她耕种自己的园地	
——访娜塔丽·萨洛特·····	143
《10/18丛书》和它的转向	
——访克里斯蒂安·布格瓦·····	162
诗歌之园的开垦者	
——访皮埃尔·瑟盖斯·····	174
与克洛德·莫里亚克	
谈法朗士瓦·莫里亚克·····	190
与克洛德·莫里亚克谈他自己·····	205
经营有方的出版家	
——访瑟意出版社与大学出版社·····	219

“于格洛采地”上的“加尔文”

——访阿兰·罗伯-葛利叶

我与罗伯-葛利叶并肩站在一个狭小的书架前，他用手攀着我的肩膀，在中国，同志式的合影经常就是这个姿势。从这张照片来看，我们似乎是老朋友了，只不过，他那巴黎风格的便装和我这身中山服，标明了我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

这张照片，是我从未料想到的结果。

首先，我到达巴黎时，根本没有想到会见罗伯-葛利叶，甚至在下飞机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会见法国作家学者的计划，因为，我在国内，甚至在美国，都不止一次听说过巴黎的作家和学者架子甚大的议论，我一直认为这种大架子是斯达尔夫人在她的小说《柯丽娜》中所批判过的那种

法兰西文化自大狂在廿世纪某些人身上的复发，我当然不准备去拜会。

然而，法国外交部文化技术司的接待一开始就甚为热情，他们主动要我提出希望会见的法国文化界人士的名单。既然外交部负责安排，那末，何妨一试？正因为我要在《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中编一种《“新小说”派研究》，所以，我提的名单中当然就包括了“新小说”派的主要人物。

过了一个多星期，接待办公室的负责人马第维先生通知我，第一次会见已经安排好了，对象是罗伯-葛利叶，时间是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半，地点在午夜出版社。

罗伯-葛利叶是我在巴黎一系列会见的“第一站”，这是我从没有想到的。

其次，从我对“新小说”派的评论和观点来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在巴黎与罗伯-葛利叶有一次——用他后来赠书给我时所写的题辞中的话来说——“友好的谈话”。对于“新小说”派，我的认识经历过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即使在见罗伯-葛利叶之前，我对“新小说”派也抱着一种“复合”的看法，既有肯定，也有否定，因此，后来我在与罗伯-葛利叶交谈时，就难免要为如何在必要的礼貌、对他和“新小说”派应有的肯

定与对他们的某种保留之间而费些脑筋。

过程是曲折的，认识也是复杂的，我必须在见罗伯-葛利叶以前，整理一下我的观点和思路。

起初的事情是这样的：

“新小说”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形成在五十年代。一九五三年，罗伯-葛利叶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橡皮块》。它看来象一本侦探小说，但又和传统的侦探小说很不一样，其中的情节难以捉摸，整个故事扑朔迷离，很难说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次年，他的第二部小说《漠然而视》问世。小说写的是一件可能的凶杀案，但作者故意不把这个案件的真实确切性写出来，因之它仅仅只是可能而已。一九五六年，他发表了《未来小说的道路》一文，这篇文章与他两年后发表的《自然·人道主义·悲剧》一文，共同提出了在二十世纪要抛开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进行新的改革和实验以建立新的小说艺术体系的主张。它与娜塔丽·萨洛特在《怀疑的时代》（1950年）中提出的主张前后呼应。那位女作家早已在进行一种脱离巴尔扎克传统的小说实验，并且写出了几部一反过去小说传统而后来被称为“新小说”的作品：《向性》（1939年）、《无名氏肖像》（1948年）、《马特洛》（1953年）。不过，娜塔丽·萨洛特那

种取消了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专注于人物心理描写的小说，不及罗伯-葛利叶的小说那样容易引起注意。罗伯-葛利叶的小说并非没有情节，也并非没有人物，只不过缺少合符逻辑的线索，事件本身的全貌难以看清，其某些方面和某些片断是通过人物精神活动和心理反应的折射而展现出来的。至于他对物的静态写生，则使人多少想起了左拉，但又比左拉更琐细。特别是，一九五七年他又出版了第三部小说《嫉妒》，这一部以全新的方法来写嫉妒这一种感情的作品，更使他获得了广泛的名声。与以上这些事情平行发展的是，米歇尔·布托、克洛德·西蒙从五十年代初也开始创作与传统小说不同的作品。这样，这些作家自然就形成了一股潮流，由于其共同的反传统小说的特点，人们就称之为“反小说”派或“新小说”派。“新小说”派一产生，其标新立异的创作实践与大声喧哗，就使它象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士兵出现在战场上一样，马上就招致了各方面的火力，人们出于各种原因指责它：反对巴尔扎克的小说传统；情节和人物都不完整；内容没有确切性，意义不清楚；过于追求文字技巧，等等，总之，它在法国就遇到“很多反对派”，用罗伯-葛利叶与我谈话时所讲的话来说，就是“很多敌人”。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新小说”派的

初创阶段，就是在它大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声势时也仍然如此。这个流派在追求标新立异的巴黎，尚且受到这种待遇，在我国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开始注意“新小说”派是在六十年代前期，那时，正是“新小说”发展的高潮时期：一九五九年，法国重要的刊物《精神》为“新小说”派出了专刊；他们，包括罗伯-葛利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克洛德·西蒙，不断发表作品，其中还不止一部相继获得文学奖，特别是罗伯-葛利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1961年）改编成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大奖，更是轰动了整个西方。当时法国的文学刊物宣称：“……‘新小说’派作家已经度过了阴冷的年头……”在巴黎，“报刊杂志和批评界都关心‘新小说’派”，以反传统的方法写小说，也成了一种时髦。既是文艺评论家，也是“新小说”派作家的克洛德·莫里亚克，当时在他的一篇报导中这样说，“新小说”派在法国“受到推崇，并继续使青年一代着迷”，而罗伯-葛利叶更是成了“巴黎文坛上的权威人物”。在国外，“新小说”派的作品在美国、西欧、日本等国都有翻译出版，被视为“当前法国文学的代表”。这个流派的新技巧也成了大学学术论文的题目，成了学者、批评家写专著的对象。

正因为如此，这才在中国引起了注意。那末，那时的中国理论批评界的流行的观点是什么呢？

在我国，由于建国初期向苏联学习的热潮，日丹诺夫关于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论断，自然影响极大，几乎被视为经典，因而，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西方现当代文学中，除了当时在政治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家以及少部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以外，几乎全都被不加分析地遭到排斥。而且，五十年代中期以后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又把意识形态领域里包括外国文学评介和研究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因此，对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派”文学，自然都一概突出一个“批”字。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我也曾批判过“新小说”派。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党中央的号召和推动下，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经历了一次意义深刻的思想解放，人们在马列主义思想原则的指导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打破了过去在很多问题上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极“左”的框框，冲出了某些偏颇狭隘的观念。如果说，在外国文学评介和研究的领域里，也有思想解放的话，那末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对日丹诺夫的论断进行了置疑和分析，就是西方现当代文学重新评价问题的提出；如果这次思想解放对外国文学工作也带来什么重

要的结果的话，那就是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评论，已成为了很多文艺刊物以及专门的外国文学杂志的重要内容，当然，全国各地出版社出版的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也比过去任何时候为多。我在这个过程中，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重新评价问题，发表过一点意见，但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在学术问题上应该有诚实的态度，因此，我在发表重新评价的意见的同时，也公开地承认了自己过去对西方现当代文学的评价有不实事求是的缺点，我没有在自己的文章里指明那是对“新小说”派而言，好在我对西方现当代文学“批字当头”也就那么一次，所指其实还是很清楚的，何况，我又对“新小说”派的得失功过作了重新评价。^①

正因为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又因为这次安排事出意外，所以，在会见的前夜，我放弃了观光巴黎之夜的愉快，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重新整理自己的观点，作些必要的准备。

窗外是灰黑的天空和树丛的阴影，又是一个阴霾的夜晚，没有月亮。附近一大片小别墅式的住宅的百叶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从里面透不出一点亮来，而只有路灯照着一条阒无人迹的马路

^① 《西方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见拙著《论遗产及其他》第169页至177页。

伸向远方，似乎这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区域，就象罗伯-葛利叶的《在迷宫里》所描写的那个死寂的城市一样。过去我看那部小说的时候，对他把一座城市描写得象神秘的梦幻一样颇不以为然，但是，我眼前的巴黎郊区之夜不同样一片死寂，同样也带一点梦幻的、模糊的情调吗？……不论怎样，眼前是寂静的夜，正堪作理论思维。那末，我要再次明确下来的思想立场究竟有哪几点呢？

第一，不论人们对“新小说”派作怎样的评价，不论对它是肯定还是否定，人们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以它所拥有的作家作品而言，以它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而言，以它在法国曾风行一时而又在国外造成了轰动而言，以它在巴黎文坛上坚持了自己的阵地达三十年而目前仍在活动这一事实而言，它都要算是法国二十世纪中期重大的文学现象之一，它总要在法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因此，我们应面对它，研究它。这，便是我要编一本《“新小说”派研究》的原因。

第二，“新小说”是小说艺术上的一种创新，它带有探索和实验的性质，它的探索和实验肯定并不都是成功的；但即使它的探索和实验很少成功，它在主张探索新路这一点上却是没有错的，应该得到我们的肯定，因为，如果没有探索和实验，也就不会有发展，既不会有“脱缰的发展”，